

# 译者行为批评的理论问题

周领顺

(扬州大学 翻译行为研究中心, 江苏 扬州 225127)

**摘要:**本文论述了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部分理论问题,包括“连续统”思想与“求真”“务实”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和“社会化”与“务实”的内外层次化、“度”(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操作性问题等,目的在于提升理论的运用效果,帮助获得可信的结论。文章兼顾讨论了“翻译单位”等。

**关键词:**译者行为批评;译者行为研究;概念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19)05-0118-06

## 0 引言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被认为是国内学者提出的原创性翻译理论之一,至今已经有整整10年的发展史,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0年期间,笔者发表了20余篇关于译者行为批评的文章,并以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汉语‘乡土语言’英译实践批评研究”(2015)作为试验田,对译者行为批评理论进行应用研究,卓有成效。”为此,《山东外语教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编辑部于2019年4月26日—28日联合主办了“全国首届‘译者行为研究’高层论坛”。来自全国90余所院校、科研机构的200多位师生齐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围绕“译者行为和翻译研究的新趋势”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研讨。“与会学者纷纷表示,译者行为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由我国学者首倡,是翻译研究的新趋势,值得持续关注和深入研究。加强中国学术话语权,是每位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期望以本次论坛为契机,构建翻译研究上的‘中国学派’而引起国际同行的瞩目。”<sup>①</sup>对于译者行为批评集中的讨论也见于《当代外语研究》2016年第5期、《山东外语教学》2016年第5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以及反思文章等(周领顺,2019a:21-29)。

研究者在运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需要反思和进一步发展的理论问题。其中一些问题是由于笔者没能在著作中阐发清楚或者论述不够充分所致,另一些问题是由于研究者误读所致,需要不断在事实的分析中得到检验和完善,提高操作性和分析过程的科学性。本文将集中解答研究者最关心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目的在于提升理论的运用效果,帮助获得可信的结论,更集中的答疑将以访谈形式发表。

## 1 “连续统”思想与“求真”和“务实”之间的关系

译者行为批评是一种评价性的理论工具,简单地说就是用于事后评价,因而需要采取条分缕析的描写做法,而“连续统”就是这样一种视角和做法。“‘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的核心架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该模式明确表示,任何译者割裂面向语言层的‘求真’和面向社会层的‘务实’的行为都是不可取的,应用‘连续统’的思想恰恰是为了不割裂二者。”(赵国月,2018:20)以“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为例,虽然可以分别述说和列举“求真”和“务实”这样两个处于连续统端点的事实,但不可否认的是,两个端点之间是互相制约的,在“求真”中有“务实”的成分,在“务实”中也有“求真”的成分,差

收稿日期:2019-04-15

作者简介:周领顺,男,扬州大学翻译行为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译者行为研究与译者行为批评研究。

①<http://journal.bisu.edu.cn/CN/news/news209.shtml>

异只表现在倾向性及其程度的强弱上。所以,译者行为批评就有了“务实性求真”(周领顺,2014b:78)和“求真性务实”(周领顺,2014b:87)、“翻译性创造”(周领顺,2014b:144)和“创造性翻译”(周领顺,2014b:144)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类互相制约和互相包容的概念,也有了“求真为本,务实为用(上)”“求真兼顾务实,务实兼顾求真”(周领顺,2014a:87)等译者行为的一般性原则和“求真为主”“偏于求真”“务实为主”“偏于务实”等诸多表示倾向性的一般表述。

所谓“倾向”,就是描写的结果,符合连续统渐变、不割裂、不绝对化的理念。当然,并非不存在绝对求真的事实,这是因为只要是翻译,就必定需要一个母本在,这是翻译的属性决定的,即使绝对靠近原文、复制原文,也有译者行为的道理,比如译者对于经典化程度最高的考古类文本即如此。虽然“连续统”常常表现为一个直线线段,但在受到文本类型和环境因素影响后会出现变化,比如形成一个首尾相顾的“二龙戏珠环”(周领顺,2014a:217)。此时,绝对求真就等于绝对务实,比如,研究考古的读者就最乐于见到事实的原貌。但脱离求真而显现为绝对务实的事实不在描写译者行为的“连续统”之上,毕竟“译者”的身份首先是译者,虽然译者具有社会性的自然属性,但与另一个自然属性的语言性互为影响、互为牵制,在译文上表现得虽然务实但仍不脱离对原文意义的求真,使译者的身份和行为处于与之相符的范畴内。摆脱了“求真”的“务实”,不在最基本的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的翻译范畴内,而是与原文没有任何关系的创造,变成了“超务实”(周领顺等,2017:24)。

当然,“所谓‘超’,不是说效果更好,而是‘超’出了评价模式的约束”(周领顺等,2017:24)。至于市场效果是不是“超务实”,则是另外的问题。比如,周领顺和杜玉(2017:24)通过例子所分析的“增补的信息,显然是出于务实的需要,但因为译者误记或误解,把《杜鹃山》误写成了《红灯记》,从而摆脱了‘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约束而变作了‘超务实’”。常有研究生在进行“求真”和“务实”的事实罗列时,表现为割裂和绝对化,因为没能深悟“连续统”的根本理念,在论文答辩时被专家组“诘难”。

## 2 “社会性”和“社会化”与“务实”的内外层次化

“务实”分为内外两类,一类是翻译内的“务实”,一类是翻译外的“务实”。翻译内的“务实”主要是译者两个属性(“语言性”和“社会性”)中的社会性使然。社会性是意志体译者在翻译活动这一社会活动时的自然行为表现。比如,在顾及原文意义的前提下,根据读者对象(如儿童读者)的接受习惯而适当增强语言的可读性(如将长句变短句、将大词变小词、增强语言表达的形象性等)。

与“社会性”相对的是“社会化”。“化”和“性”的不同在于,“化”是外在的,比如“风化”,《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由于长期的风吹日晒、雨水冲刷、生物破坏等作用,地壳表面和组成地壳的各种岩石受到破坏或发生变化”。“性”是天然的、内秉的。社会化的“务实”在翻译的范畴外,社会化的行为常常不是一名译者应有的、自然的行为,所以常常不受“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的约束。翻译范畴外的“务实”,事实上成了摆脱译者身份和翻译范畴的“超务实”。如果因为外在的影响而不得不让译者的行为发生根本性改变(比如完全脱离原文的意义),那么此时的译者行为也只能是一名普通社会人的行为,与“译者”的身份和行为相去甚远。比方说,原文广告的是衬衫,而你认为目前衬衫不好销售擅自改为你认为市场热销的裙子一样,消费者读到“译文”时所表现的接受效果虽然很好,但与原文所表达的意思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若将广告的商品投放市场,就变成了商业欺诈。另如伊文·金(E. King)改变了《骆驼祥子》的结局而令作者老舍不能接受。因为对于以讲故事为主的小说而言,故事结局就是小说的质,是其生命所在,而故事的详略删减只是量的问题,因此,任何更改原文本质意义的行为都属于“超务实”的行为。

当然,“化”有程度的不同,如果对译者行为不构成质的影响,就会使之变成译者社会性应有的考量,比如意识形态因素对译者产生的部分影响而使译者将一个句子中涉及的相关因素删除或淡化。所以,译者的“社会性”行为也是非本质上的“社会化”的结果。此时的“社会性”和“社会化”互相渗透、互相制约,“社会性”行为会因为融入主动的目的性因素和被动的环境性因素而使译文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原文。对此,周领顺(2014a:227)以北京古代四层城池(“紫禁城”“皇城”“内城”和“外城”)的分布为类比,形象地说明了译者

社会性和翻译社会化的过程。偏离“紫禁城”(原文中心)的过程,除了语言文化等客观因素外,主观上的译者行为整体上都属于社会化的过程;从原文中心的“紫禁城”走向社会中心的“外城”<sup>①</sup>,在这一过程中,译者的主观性得到了彰显。翻译范畴内的“社会化”(社会性)和翻译范畴外的“社会化”所不同者,主要表现于译者的社会性会兼顾其语言性,在译文上表现为“务实”兼顾“求真”,二者密不可分,或者如钱锺书所说的在译者身份下,译者具有“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严肃执行翻译的任务,能写作的翻译者就会有克己工夫,抑止不适当的写作冲动”(钱锺书,1984:705)中的“克己工夫”。“克己”就是译者社会性对于其“语言性”的顾念和兼顾,而翻译范畴外的“社会化”表现为不受原文约束的、没有边际的“天马行空”,在译文上表现为脱离原文意义的“超务实”。或者表述为:在“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内,译者的身份是译者,“求真”表现其语言性,指向原文的意义;“务实”表现其社会性,指向读者和社会的需求,总体是微观层面的问题。“求真”和“务实”、“语言性”和“社会性”互为关系。超出此评价模式的“务实”摆脱了译者的译者身份,沦为“非译者”,译文为“超务实”,总体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务实的过程是翻译社会化的过程,也是译者社会性增强甚至直至被社会化为纯粹普通社会人的过程。翻译内的“务实”和翻译外的“务实”有重叠之处。概言之,“连续统”渐变和互相制约、互不割裂、不绝对化的理念表现于译者行为批评的各方面。

就翻译事实而言,语言和商业等、翻译和创作、求真和务实以及译者和作者、译者和读者等等因素相互融合,呈现为“马赛克”状态,这也是造成“翻译单位”讨论长久以来陷入僵局的一个致因。但是,笔者将“翻译单位”分为两个层次,宏观层次以篇章为单位,微观层次以句子为单位,这样至少能将“译”和“非译”或者“翻译内”和“翻译外”分得比较清楚。比如,以“省略不译”(省译)为例,在句子单位,省略了语言层面的个别内容并不影响原文的语用意义,属于“翻译内”,语内省译,如葛浩文把“咱去弄个叫花子来当替死鬼,来它个偷梁换柱李代桃僵”翻译为“We'll find a beggar to take your place, what they call stealing beams and changing pillars, to manage a bit of trickery.”因为“偷梁换柱”和“李代桃僵”意思相同或相近而省去了“李代桃僵”。脱离语言层面的省译,则属于“翻译外”,语外省译,即姜智芹(2011:282)分析的:“就葛浩文本人来说,他对小说进行删改的原因,一是很多历史、文化典故难以用英语表达,二是认为美国读者未必会对被删改的部分感兴趣……他说美国读者喜欢篇幅短小的故事,越短越好,上下两册的小说,在美国基本上没人会看。”

“社会性”和“社会化”之别反映的是“翻译内”和“翻译外”之异。社会上认可的好不好是多方面的,与“社会”本身一样,是个复杂体,正如廖七一所言:“我们当今面临的翻译实际问题,如城市公示语的翻译与管理、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典籍的翻译与对外宣传、翻译与中国近现代精神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等重大问题,均超越了单一的翻译问题,也不是翻译家内部合作就能完成,必须由不同学科的专家携手攻关,运用多学科的理论 with 知识方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高伟,2015:5)所以,只有明确翻译内外的分野,才能开展科学、理性的翻译批评。周领顺(2014a:12-16)所区分的“翻译内”和“翻译外”“译内反应”和“译外反应”(周领顺,2014a:16-22)、“译内效果”和“译外效果”(周领顺,2014a:273-276)等正是为翻译批评的科学化所做的努力。根据“务实”的实际,大体可以分为“翻译内的社会性务实”和“翻译外的社会化务实”,这也是“翻译”和“创作”“社会性”和“社会化”“译者”和“创造者”的区分。

### 3 “度”(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操作性问题

翻译上的“度”最难琢磨,以往讨论的忠实度,也只不过是给出了一个大致的情形。比如杨自俭(2008:4)说道:“译文靠近原作靠到什么程度,很难用百分比(99.99%、99.95%、99%、98%等)来表述,不过可以建立包括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评价指标来评定译文和原文的靠近度,从而可按靠近度的大小排出顺序来。”杨自俭(2008:4-5)还说:

离原文最近的译文在译文变体集合的一端,离原文最远的译文在译文变体集合的另一端,它们中间有无数不同形态的译文。离原文最远就是离译语写作最近,“最远”就是到了属性要改变的右临界线,超出了

<sup>①</sup> 周领顺(2014a:227)所绘的城池图误把“外城:社会中心”写成了“外城:原文中心”。

右临界线翻译就不再是翻译,而变成“写作”了。集合两端的译文都是翻译,但离原文最近的译文的属性由三个条件决定:有原文文本参照、内容忠实、形式忠实;而离原文最远的译文的属性只要有原文文本参照这一个条件就决定了。看来翻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译文的形态是从离原文最近的一端向离原文最远的一端逐渐异化,也就是逐渐弱化翻译的性质属性,一直到右临界线(译品与译语之间),过了右临界线就完全异化而丧失了翻译的性质属性。

不仅是翻译上的“度”不好精确地刻画出来,即使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但好在译者行为批评追求的是行为的倾向性描写,而对这一倾向性的范畴和可能性做出限定和分析完全是有可能的。

为配合“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对译者行为和译文进行更加全面、客观和科学的描写解释,笔者又提出了三个“度”,即“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周领顺,2014a:248-254):

“求真”是面对原文的,“务实”是面对读者/社会的,前者看求真度,后者看务实度,而理性的译者处于原文要素和读者要素之间,其理性程度与文本平衡度决定着他行为的合理度。合理度是建立在求真度和务实度的基础之上的,三者是互相制约的关系。

为了对行为倾向进行可能的量化描写,笔者(周领顺,2014a:250)制作了一个量级图<sup>①</sup>:

| 三要素         | 译文   |      | 译者行为(译内+译外) | 主观评价 |
|-------------|------|------|-------------|------|
|             | ①求真度 | ②务实度 | ③合理度        |      |
| 量级<br>(+/-) | +    | +    | +           | 最佳   |
|             | -    | +    | +           | 较佳   |
|             | +    | -    | +           | 较佳   |
|             | +    | -    | -           | 较次   |
|             | -    | -    | +           | 较次   |
|             | -    | -    | -           | 最次   |

所谓“主观评价”,就是得出的译者行为倾向近似度,至于近似的程度能精确到什么地步,需要通过翻译事实的条分缕析和佐证才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比如周领顺和强卉(2016:103-112)对于“厚译”的层次性分析。

“求真度”针对文本意义,是语言范畴内的事;“务实度”是就社会需求包括读者而言的,是文本外的事;“合理度”是在“译者”身份下对“求真度”和“务实度”的综合把握。说白了,是从译者身份出发的,在新的研究中,笔者宁愿把从译者身份出发的“合理度”称为“认知平衡性”(周领顺,2019b)。所谓行为的“平衡性”,主要是译者认知上的,译文是译者综合各种因素才释放的自己心理上认可的结果。

但事实上,因为“务实”既有翻译内的(此时与“求真”相互制约),也有翻译外的(此时摆脱了“求真”的约束),因此在进行“合理度”评价时不可能不兼顾考虑译外的行为和效果,毕竟译者的纯社会人角色和行为也会为社会的接受效果(如市场效果)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因为译者行为批评专注于译者身份及其行为,所以只是不把超出此范围之外的因素作为重点考虑的对象罢了。

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上的量级图中的“译者行为”包括译内和译外,是广义上的。因此,“合理度”不仅包括了翻译内的“务实”,也包括了翻译外的“务实”,即上文的“超务实”,所以才会出现文本求真度低,效果务实度低,而译者行为合理度却高的情况。

先看翻译内的“求真”和“务实”。陆谷孙在为《中华汉英大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所作的“前言”中写道:

男士便池警句:“我们要为您提供方便,请您也要瞄准了再方便 We aim to please; you aim too please”,虽

① 原图中的个别标示有误,导致研究者在使用时陷入迷茫。这里予以纠正。

有类似文字谜语之弊,但不能否认是极简主义的实用例子,是“瞄准”条的合适例证。

显然,陆谷孙认为把“*We aim to please; you aim too please.*”译为“我们要为您提供方便,请您也要瞄准了再方便”是值得称道的。但这样的译文若出现于真实的男士便池环境,就既没有求取原文风格至简之真,也难以达到原文上口易诵的务实效果,拗口是显而易见的,尽管没有改变原文的意义。求真度不高,务实度也不够高,合理度总体降低。笔者试译为“我们瞄准君所愿,请君瞄准行方便”,除了实现“愿”“便”押韵外,“方便”又构成了新的双关,一是指小便行为,二是指配合清洁工人维护环境卫生的行为,这是为提高三“度”所进行的翻译内努力。

再看翻译外摆脱了的“求真”的“务实”。比如,当年香港电影片名的翻译中多次出现“总动员”这一表达,这是受到早前施瓦辛格主演《魔鬼总动员》一炮走红的影响。增添的“总动员”并没有求真于原文的意义,但务实社会的效果(票房收入)高,就说明译者行为的合理度高,只是超出了语码转换和意义再现的翻译(翻译内)范畴,是摆脱了“求真”约束的“超务实”,也自然摆脱了狭义上的“译者”身份。也就是说,当“务实”和“求真”相对而言时,二者是互相牵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摆脱了“求真”的“务实”就是摆脱了狭义上“译者”身份的“超务实”,前后叙述互为一致。

在一个习惯典雅文字的年代,译者行为倾向于典雅,这就是合理;在一个喜欢白话文的年代,译者倾向于直白,也是合理,但并未因此改变原文的意义。所以,合理度是受外部各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但是,如果求真有余而务实不足,译者行为的合理度自然不能算高,而既求真于原文的意义又兼顾了市场的务实效果且确实有数据证明市场效果好的,合理度自然就高。在翻译实践中,最大的合理度其前提是确保译者的总体身份不变,使翻译尽可能维持在翻译的范畴之内。总之,“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都可以细化出很多可执行的细则来,而细化出来的任何内容又会成为研究者新的贡献和创新。

#### 4 结语

本文论述了译者行为批评的部分理论问题,包括“连续统”思想与“求真”和“务实”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和“社会化”与“务实”的内外层次化、“度”(求真度、务实度和合理度)的操作性问题等。理论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在与新的事实相结合时,必然会出现新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不断反思,边梳理边进步,目的在于提升理论的运用效果,帮助获得可信的结论,特别在译者行为专题研究和译者行为批评运用10年后的今天,更显得弥足珍贵。

理论性的问题多反映为概念之间的问题,而概念的明晰化,除了推理之外,还主要体现在运用于事实分析时的操作性上。笔者把译者行为批评的工作原理公式化为:译者两属性(语言性和社会性)、视野两分明(翻译内和翻译外)、身份行为分内外(内部社会性和外部社会化)、一条主线贯始终(意志-行为-痕迹-规律+应用)和描写“连续统”(比如“求真-务实”连续统,以阶段性特征描写和分析的方法,不持二元对立的、割裂式的态度,可以最大限度地确保客观和公正)。在理论的构建过程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一定要做到自圆其说,更重要的是在结合事实的过程中不断完善,从工具性的角度上讲,其意义要大于那些无答案而又无休止的概念之争。比如黄勤和余果(2017:29-39)、黄勤和王琴玲(2008:103-109)、黄勤和刘晓黎(2009:131-141)等系列论文都是建立在充分的事实之上而证明译者行为批评工具性的。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是中国本土理论之一。冯全功(2019:38)写道:“观察中国翻译研究近十多年的发展,笔者认为,目前能够称得上学派或初具学派雏形的主要包括: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谢天振的译介学、黄忠廉的变译理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吕俊的建构主义翻译学、许渊冲的文学翻译理论等。对于本土翻译理论,韩子满(2019:23)认为除了生态翻译学外,“其他原创翻译理论还有译者行为批评理论、翻译地理学、翻译经济学、和合翻译学、大易翻译学等”。尽管他们提到的理论范围不尽相同,但译者行为批评都包括其中,译者行为批评将和其他本土理论一道,为翻译研究的“国际转向”添砖加瓦!

## 参考文献:

- 冯全功. 2019. 翻译研究学派的特征与作用分析——以生态翻译学为例[J]. 上海翻译(3):38-43.
- 高伟. 2015. 翻译研究发展趋势·中国学术话语·MTI 翻译理论教学——廖七一教授访谈录[J]. 山东外语教学(1): 3-7.
- 韩子满. 2019.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笔译研究:学科的诞生、成长与成熟[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1):20-26.
- 黄勤,余果. 2017.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黑白李》三个英译本中熟语翻译比较[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29-39.
- 黄勤,王琴玲. 2018. 林太乙《镜花缘》方言英译探究:求真还是务实[J]. 外语学刊(1):103-109.
- 黄勤,刘晓黎. 2019.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肥皂》中绍兴方言英译策略对比分析[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131-141.
- 黄勤,余果. 2020.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语境顺应——《老明的故事》王际真英译本中对话策略分析[J]. 语言教育(1)(待刊).
- 姜智芹. 2011.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国外的传播与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
- 钱锺书. 1984. 林纾的翻译[G]// 罗新璋. 翻译论集. 北京:商务印书馆,696-725.
- 杨自俭. 2008. 对翻译性质属性的认识[J]. 上海翻译(1): 1-5.
- 岳中生. 2019. 译者生态位与“译者中心”[J]. 上海翻译(4):14-18.
- 赵国月. 2018. “译者行为批评”几组概念正解——与宋以丰商榷[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4):13-23.
- 周领顺. 2014a. 译者行为批评:理论框架[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 2019a. 译者行为研究十周年:回顾与前瞻[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21-34.
- 周领顺. 2014b. 译者行为批评:路径探索[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周领顺,杜玉. 2017. 汉语“乡土语言”葛译译者行为度——“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视域[J]. 上海翻译(6): 21-26.
- 周领顺,强卉. 2016. “厚译”究竟有多厚?——西方翻译理论批评与反思之一[J]. 外语与外语教学(6):103-112.

## Some Concepts of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ZHOU Lingsh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concepts of the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including the conceptions of “continuum” and “truth-seeking” and “utility-attaining”, “sociality” and “socialization” and the stratification of “utility-attaining”, and the working of “degrees” (i. e. degrees of truth-seeking, of utility-attaining and of rationality), etc. The aim is to strengthen their practical use and help to draw reliable conclusion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ranslation unit” as well.

**Key words:** Translator behavior criticism; Translator behavior study; concepts

责任编辑:蒋勇军